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Classics of Literary The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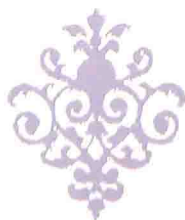
西方文论经典 (第六卷)

后现代与文化研究

高建平 丁国旗◎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XIFANG WENLUN JINGDIAN

西方文论经典

(第六卷)

后现代与文化研究

高建平 丁国旗◎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文论经典. 第六卷, 后现代与文化研究/高建平, 丁国旗主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396-3828-7

I. ①西… II. ①高… ②丁… III. ①文艺理论-西方国家-现代-选集 IV. ①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10184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策划统筹: 朱寒冬 沈喜阳
责任编辑: 沈喜阳 刘姗姗 装帧设计: 徐 睿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 press-mart. 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 awpub. 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0551) 65859551

开本: 700 × 1000 1/16 印张: 49.25 字数: 850 千字

版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8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方文论经典》编委会

主编：高建平 丁国旗

编委名单(以姓名字母排序)：

陈中梅	丁国旗	丁怀超	范玉刚
高建平	耿涛	贺玉高	李世涛
陆建德	史忠义	王进进	吴晓都
杨俊杰	章国锋	张中载	周启超

总 序

安徽文艺出版社作出决策,要出版一套六卷本的《西方文论经典》,这促成了我与一群年轻人有了合作的机缘。我主要是提出想法和建议,具体工作主要是丁国旗与我的一些年轻朋友们做的。经过几年努力,这套书终于要面世了。出版之际,受大家的委托,在这里写几句。

我们已经有了不少文论选的书,有的是中国学者编的,有的是外国学者编了以后中国人翻译的。一些重要的西方文论的选本,曾经对我们产生过深远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还要编这套书呢?在前人的基础上,我们能做一点什么?我想做的事,首先就是,要编出这样的一套书,它不是西方历史上重要文论家的重要言论的辑录,而是选出一些重要的文章,或者专著中较为完整的段落,并加以解说。

相比较而言,言论辑录不是独立的读本,而是文论史的配套读物。记得我以前读过波兰美学家塔塔凯维奇所写的三卷本《美学史》。这套书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上一些相关的原文与英文对照语录。这样,能多少读一点古希腊文、拉丁文,以及其他语言的人,可以看到原文,不能读的,也没有关系,有英文翻译。但是,这种语录式的辑本大都不能独立地去读,只能附在相关的章节后面,为美学史作配套。

我们编这套书,是要选出较为完整的章节,使它们本身就有可读性,让作者本来的意思获得展现。在此基础上,我们再配上有关作者个人和所生活时代的介绍,配上对所选章节的解读和阐释,希望读者能独立地,不用随时翻看相关的历史著作,就能读下去,读完它,读懂它。我当然不反对读者在读这套书之前或之后,去读有关西方文论史的著作。我们所做的事,是不希望这套书成为某一套或某一派文论史著作的配套读物,为这些史书做注脚。读这套书,

不带任何框架地去看他人是怎么说的,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读西方文论,我们逃脱不了寻找警句的习惯。读一些古代著作,最后留在人的口中和记忆中的,也常常是一些警句,如艺术即模仿、寓教于乐、风格即人,等等。其实,这些警句在人们许多世纪的反复引用过程中,早已改变了原初的意义,而获得了新的意义。意义的改变,原有意义的被误读,新的意义的获得,是事实,需要被人们承认。马克思曾经说过,被曲解的形式,常常是普遍的形式。但是,我们学习和理解西方文论,仍需要做一件事,即回到原初的语境中去,回到命题的原初意义上去。这套书所做的是,帮助人们在这方面向前走一步,提供这些警句出现的语境,使他们的意义能在其原初的语境中显示出来。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有过一些讨论。其中争议比较多的,是分期和分类。例如:何谓近代?何谓现代?又何谓当代?再比方说,某位作家、艺术家属于哪一个“主义”。在这种种分期与分类中,有约定俗成的分法,我们也不得不照常规办事,有时,在处理时,只好从俗从众,不能完全由着性子来。但尽管如此,我仍想有所坚持。

在分期的问题上,我想避开近代、现代和当代的提法。在中国,这种提法的意义是明确的,与政治史的分期联系在一起。如果原封不动地将政治史的分期推到文论史上,并且将中国学界所习惯的分期推到西方文论上,就会带来一些误解。因此,我们采用以一些代表性的文论家和文论现象作为分期依据的做法,努力使分期淡化、相对化。当然,历史总是连续发展着的,任何分期都会带来争论。抽刀断水水更流,分期只是断水的刀而已。我们这套书分了六卷。为了使书能够分卷,为了叙述和分工的方便,我们决定用现在这个分法。这么分,肯定会引起争议,我们也欢迎批评。希望通过争议,加深对西方文论史的连续性、历史关联性、各个不同国家的相互影响关系的深入了解。

我们这套书在一些地方,仍免不了用“主义”、“思潮”和“流派”来分类和分组。在阅读西方的一些文论著作时,我最反对的是这样一种做法,即“演绎法”:认定某位作家或理论家属于某一种“主义”、“思潮”和“流派”,假定他必然会持某种观点,然后在他的论述中寻找这种观点的佐证。实际上,一个人的

思想和观点,是这个人在当时的文学艺术实践中,作出的独立的分析和提出的特有的主张。在这里面,有着这个人的个性,他或她的独立思考,当然也与这个人所处的具体时代、生活和艺术处境有关。因此,对于历史上的文艺理论家,特别是一些重要的文艺理论家,首先要把他们作为个人来看,读懂他们,其次才是他们与一些流行的“主义”、“思潮”和“流派”的关联。这是一种悖论:一个人常常只有从属于某种“主义”、“思潮”和“流派”时,才会被头脑简单的史家所提到,被大众所接受,从而变得有名;但是,一个人只有在超越了自己时代流行的“主义”、“思潮”和“流派”,展示出作为个人的独特发现时,才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在与编写组讨论时,反复提示,我们不能随意给所涉及的人物贴标签,更不能以为贴上了标签就万事大吉,鉴定完毕、解读完成。每一位能选入到这个选本中的文论家,都是大师级的人。他们有着自己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才是最可宝贵的。个人绝不是“主义”的注脚,相反,“主义”可成为个人的最不完善的注脚。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什么别的亮点的话,这就是:一直选到当代。这是我们花了很大力气做的一件事。写过任何一种历史,无论是政治史、哲学史,还是文学史、艺术史的人,都有体会,最难写的是当代史。我们做选本也是如此。一直选到当代,这是一件很难做的事。哪些文本是当代最重要的文论文本?对这些文本如何评价?我们选英美法德意的文论家们,如果这些国家里的人自己都对本国的文本的重要性和价值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我们又怎么办?但是,再难也得做啊!不绕开,不怕被人指责,从这套书的实用性出发,一定要选到当代,这是我一直坚持的设想。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如果由此招来一些批评,那会是很好的事。毕竟,我们提出问题了,就此讨论起来了。通过讨论,逐渐形成共识,以后就会做得更好些。

最后,我想谈谈西方文论对我们的重要性问题。过去一个世纪,西方文论大举进入中国,是好是坏,福兮祸兮,众说纷纭。我的想法是,它已经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西方文论要为我所用。过去的一百年,正是在这种不断接受西方文论和重读古代中国人有关文学艺术和论述的过程中,发展出现代中国文学理论的。我们谈论从“诗文评”到“文艺学”的发展线索。实际上,从“诗文评”到“文艺学”的转化,不是一种自然的生长,而是一种学科的移入、嫁接的过程。

古代中国没有一个被称为文学理论的学科。我们是从西方吸收了这个学科，有了学科意识以后，再续上历史脉络的。这种接续历史脉络是必要的，但不能由于历史脉络的接续而否定一百年来的接受。

关于怎样发展中国文论的问题，我已经在许多地方说过了，还是三句话：“拿来主义”、“实践标准”、“自主创新”。在这三句话中，第一句，是“拿来”。西方文论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接着“拿”。“拿”古代西方的理论，重读经典，既要读懂原意，也要读出新意。这些经典，永远不会过时。我们有时会读到这样一些文章，其中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说得不对，说乱了，那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要不断地回到这些经典大师那里，从他们的问题出发，在论述中说出新意。我们还要“拿”当代西方理论。这不是说跟着他们的种种新的“主义”走，而是深入思考他们的问题。这些思考有助于发现我们自身，找到中国文学理论当前困境的原因，看到发展的前景。当然，“拿来”以后，我们还是要面对中国文学艺术的现实，让这些理论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和艺术实践之中，从而最终实现理论的创新。

谢谢与我一同工作的这一群年轻人，这套书是我们愉快合作的见证，是我们友谊的见证。希望这次合作的经验，对他们未来的研究工作有所助益。当然，这项工作，也是任务来了，便要硬着头皮应对的一种尝试而已。多年前，我也曾经想过编这套书，但到了可以编的时候，仍深感准备不足。现在看来，这套书可能还有许多的缺点，有很多的不尽如人意之处，算是抛砖引玉吧。希望各位同行批评。如果能引来金玉良言，那也是这套书的一个收获。



2013年3月5日

目 录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003

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011

哈贝马斯和利奥塔论后现代性 /031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048

文化战争:现代和后现代的论争 /064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080

理论的兴亡 /092

西方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 /109

实践哲学研究中的某些问题 /133

艺术和大众文化 /151

文化工业再思考 /168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 /178

论新感性 /189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节选) /209

文学 /225

马克思主义和内部形式 /237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节选) /251

卡夫卡与意识形态快感 /261

文化研究

大众文明与少数人的文化 /277

文化与社会 /289

文化研究:两种范式 /302

文化的观念 /314

亚文化:风格的意义 /331

象征交换与死亡 /348

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363

图像与媒介

眼睛所遇到的…… /373

媒介即是讯息 /390

景观社会 /406

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414

娱乐至死 /429

女性主义

荒原中的女权主义批评 /443

妇女的时间 /451

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 /461

臣属者的文学表现——一个来自第三世界的妇女文本 /471

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 /487

超越女作家批评和女性文学批评 /497

性别研究

第二性 /513

性别差异 /530

文学研究的批评术语:社会性别(gender) /548

性别麻烦 /563

女人的阳刚气 /573

后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再思考 /587

属下能说话吗? /605

献身理论 /657

论民族文化 /677

新历史主义

知识考古学引言 /697

通向一种文化诗学 /710

宣称文艺复兴:文化诗学与文化政治学 /723

评新历史主义 /735

福柯的遗产:一种新历史主义? /749

历史一如既往? 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 /765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

[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 赵一凡译

本书研究的对象是有关最发达社会里的知识状态。我决定以“后现代”一词表述这种状态。该词目前在美洲大陆的社会学家和批评家中间颇为流行。人们用它来指示我们眼下的文化处境：历经 19 世纪末以来的多重变革，从科学、文学到艺术的游戏规则均已改换。而本书试将上述变革置于叙事危机的范围内加以考察。

科学始终同叙事发生冲突。依照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大部分叙事不过是寓言传说。但是，科学除了在陈述有用常规和追求真理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它仍然不得不证明自己游戏规则合法性。于是它便制造出有关自身地位的合法化话语，即一种被叫作哲学的话语。我将使用“现代”一词指示所有这一类科学：它们依赖上述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例如，按照理性的双方可以达成一致意见这一观念来判断，具有真理价值的陈述在陈述者和倾听者之间导致共识的规律便能够成立，这就是启蒙叙事。在这类叙事中，知识英雄总是朝着理想的伦理—政治终端—宇宙的和谐迈进。从此例可以看出，如果利用暗含着一种历史哲学的元话语去证明知识的合法性，随之引起的疑问便将有关那些支配社会制约关系的机制，它们本身也需要合法化证明，因而正义同真理一样都受到宏伟叙事的关照、保护。

用极简要的话说，我将后现代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态度无疑是科学进步的产物，而科学进步反过来预设了怀疑，与合法化叙事构造瓦解的趋势相呼应。目前最突出的危机正发生在思辨哲学领域，以及向来依赖于它的大学研究部门。叙事功能正在失去它的运转部件，包括它伟岸的英雄主角、巨大的险情、壮阔的航程及其远大目标。它逐渐消散在各种叙事

语言因素的迷乱星云里,其中掺杂着叙事、指示、命令、描述等成分,而每一星云又依照它自身独有的语用学规律进行旋转。我们大家都生活在众多星云的交接面上,然而,我们无须建立稳固的语言组合,已建立的组合体制也不一定发挥交流作用。

未来的社会因此将不大可能落入牛顿式人类学的规范(诸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反而会遵循一种语言粒子应用学的规律。语言游戏层出不穷——具有多种成分的异质生成性质。它们只能导致机制的分解,即局部决定论。

但是,决策人物企图按照输出或输入原理来管辖那些社会性语言星云,他们所追随的逻辑是:所有的语言因素都可以通约,因而整体也是能够被决定的。他们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计量分配以促进权力的增长,不论是在社会正义还是在科学真理问题上,这种权力的合法化都同样地建立在优化系统操作,即效益的基础之上。将这一标准运用到我们全部的语言游戏中,必定会带来某种恐怖裁决,它或软或硬,迫使语言要么将自己操作化(可通约),要么自行消亡。

极限操作逻辑当然常常自相抵触,尤其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引起矛盾。它同时要求较少量劳动(以降低生产成本)和较多工作(为减轻失业人口的社会负担)。可我们的怀疑态度如此强烈,以致我们现在不再像马克思当年那样,期待着从成堆的矛盾反常中升腾起拯救之光。

尽管如此,后现代状态不等于幻灭,正如它不等于对非合法化的盲目肯定那样。元叙事衰亡之后,合法性将在何处安身?操作标准属于技术范畴,它同真理或正义的判断无关,合法性是否如尤根·哈贝马斯所说,将会在经过讨论而得出的一致意见中出现?这种意见的同一性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变性,而创造发明总是起源于争辩、分歧。后现代知识并非仅仅是权威手中的工具:它增强我们对差异的敏感,促进我们对不可通约事物的宽容能力,它的原则不是专家的同一推理,而是发明家的谬误推理。

这里的问题是,一种社会制约的合法化,一个公正的社会,是否能依照类似于科学活动的反论形式建立起来?而这一反论又是什么?

如今,合法化问题已经不再被当作是科学语言游戏的一项失败。更为精确的说法是,它作为问题已将自己合法化了。就是说,它已变为一种启发式推动力量。但这种颠倒首尾的处理方式仅仅是最近的事。在它落入这一步之前

(即某些人称作实在论的阶段),科学知识曾经寻求过其他解答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在一个长时间内不得不求助于公开或隐蔽的叙事知识程序,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叙事知识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返回到非叙事知识中的动向,不应被认为是过眼烟云,一去不返。请看这一赤裸证据:每当科学家有所“发现”,应邀发表电视讲演或接受报刊记者采访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追述一部知识的史诗,而这史诗毫无史诗味。他们按照叙事游戏的规则玩弄科学,而叙事的影响不但明显作用于电视观众,也左右着科学家自身的情绪。这一事实既不琐碎,也不是附加的花絮,它直接涉及科学知识同“通俗”知识(或者说是它的残余物)之间的关系。国家花费巨额金钱以便让科学像史诗那样公开上演,这意味着国家本身的合法建立在史诗之上,而国家要利用史诗获取决策者们所需要的公众赞同^①。

可以设想,向叙事回归是种必然动向,至少科学语言游戏在追求真理性陈述的同时,没有方法和能力来使它们的真理依靠自身证明自己是否合法。假如确实如此,就有必要承认,历史自有一种不可缩减的需要,这需要不像前面所认为的——仅仅是为了记忆和表达(即历史性或叙事口吻的需要),恰恰相反,历史的这种需要是忘却(*metrum*)。

我们正在超越自己。但在前进途中我们应当牢记,有关合法化问题的那些明显被废弃的陈旧解决方案在原则上并未过时,仅仅是在表述方面失败了。如果发现它们以其他形式延续至今,我们也不必惊讶。难道我们自己在此刻不也正痛感有必要在西方建立一种科学知识话语,以便澄清它的暧昧地位?

科学的时新语言游戏将其合法化问题置于先河初开之处——柏拉图。这里不便对柏拉图《对话集》做详细解释,但科学语用学正是在这本书里开始起步,当时它一半是被当作明晰主题,一半是含蓄的假定。这种对话游戏,加上它特殊的规定,实际上凝聚了科学语用学的精髓,并包括了研究和教学两种功

^① 关于科学家的意识形态,参见《幸存》(*Survive*)杂志 1971 年第 9 期,后重印于尧伯和列维-勒布隆编的《科学的(自我)批判》,第 51 页后,该书附有索引,列举各杂志和团体争论科学如何从属于国家制度的情况。